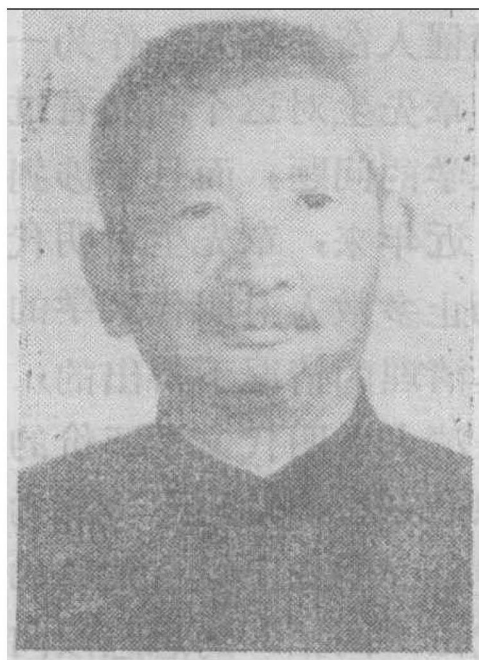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秀民自传



张秀民谱名荣章，字涤瞻，浙江嵊县人。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（戊申）阴历十二月初八日，俗称“腊八”（公元1908年12月31日）。我的祖先自南宋初以来即世居嵊西永富乡（今改昇高乡）廿八都村。先祖以提篮卖笔为生，亦在秀峰村教书。先祖早卒。时先考六岁，赖祖妣袁氏含辛茹苦，抚养成人。先考师事裘宪邦先生，曾至东乡湖头村教书，也在家中设私塾，课生徒。尝向一村中财主借银一百元，在借契上他以草书“不得已”三字作签字画押，被人识破，债主即登门索还。不得，则咆哮辱骂，时不肖正弥月也。先考卧床三日，愤而出走，至杭州，当警察，后即从军。先妣裘氏，崇仁（离村五里）人。十四岁以童养媳来归。家中壁立，先妣即为邻居护理产妇，或养蚕，或踏碓舂米，至数十里外高山采茶，以所得微资为添补衣服日用。后赖先考寄归微薪，始还清旧欠。

余六岁即上本村瞻山小学，考试常“背榜”。常在暑假冒烈日至田间拾田螺，所得辄比邻儿多，除自餐外，尚有余以售人。尝积攒制钱一二百文，为家中买油盐之用。秋冬至附近瞻山或西山湾拾柴，一日挑柴篮归，适值大妹诞生，时余九岁也。后转学

崇仁高小，功课已列前茅。毕业后至嵊县中学，肄业二年。随沈亚孟（贤修）师转学宁波四明中学，学校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、浸礼会合办，初次接触到美国老师。学校初在宁波江北岸，后迁北门外。因为是教会办的，每礼拜天要做礼拜，唱赞美诗，听牧师讲道，吃饭要谢上帝。当时我很有反感。适值五卅惨案发生，学生成群结队去游行，喊口号、示威，我也去参加。学校有一小图书室，当时我喜欢看卫生医学书，把所有这类一二十本小册子都看完。古人说“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”，我不喜欢政治，也想当良医。后来觉得做医生，天天和病人打交道，实在不卫生，就不想当了。

高中将毕业时，国文课上读了黄炎培写的《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记》一文，以为陈先生在南洋经商所得千万巨款，不为个人之安乐享受，而在其出身地福建集美乡（旧称浔尾）创办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师范、商科、航海等校，使全村成为名闻全国之学校村。又在厦门岛上创办文、理、教、法、商综合性的厦门大学，其大公无私之精神，实为难得。该校招生章程载有学生成绩优良者，可得陈嘉庚奖学金（即全免学费银七十元）。海滨校舍，风景如画。乃不胜向往，赴上海招考处投考。幸蒙录取。

余读文学院国学系，同班不过四五人，但与集美国学专修科学生包树棠、林成章等三四十人，一同上课。老师有威县周岸登（道援，清举人，出版词集《蜀雅》）、泰县缪篆（子才，章太炎先生之弟子）、南昌余睿（仲詹，举人）、盐城郝立权（曷衡，刘师培弟子，著《陆士衡诗集注》）、瑞安孙诒让之弟子李笠（雁晴，著《史记订补》、《三订国学用书撰要》）、义乌朱桂曜（云圃，出版《庄子注》）。后又有萧炳实（项平）先生。当时读的书有《管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文心雕龙》、诗词散文音韵学等，及必修课国文、英文，也选修了法文、日文、德文、拉丁文（后两者仅学半年，早已忘光）。李师

讲《汉书艺文志》，从此对于目录学发生兴趣。

集美楼在学生宿舍映雪楼旁，是学校的图书馆，藏中西文图书数万册，下为书库，上为阅览室。馆中负责人不阻止余进书库翻书，因此只要不上课，就进库自由阅览，涉猎有关板本目录的书。一次见架上有一本英国霍氏的目录学入门书，不忍释手，于是略知一些西洋印本书的知识。

在校时曾发表过《评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及子部杂家类》一文，又写了《宋槧本与摇床本》一文（后译为摇篮本），略述宋版书与十五世纪摇篮本的异同，寄往天津《国闻周报》。当时该刊广告上介绍本文作者是厦门大学教授，殊可笑。毕业要写论文，我的题目是《宋活字版考》，就算通过毕业了。

厦大因为是陈先生办的，学生大部分是福建泉州、漳州、福州人，又有部分潮、汕、梅县人，江浙人很少。毕业生很多远渡南洋，投亲靠友，或教书，或经商，有成为百万富翁的，也有在本省或外省任职的。当时社会上大学毕业生虽寥寥无几，而求职若无门路，却极困难。李雁晴师对我的前途很关怀，把我发表过的上述两篇论文寄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（今北京图书馆）副馆长徐水袁同礼先生（守和，正馆长为蔡元培先生）。李师与袁先生并无深交，但袁先生看了这两篇文章后，当即由馆方名义来信，谓新馆落成（即今文津街馆）需人，望速来。于是未及戴方帽，行毕业礼，就乘海轮北上，先至老家辞别母亲、祖母等。在校年年得奖学金，为节约旅费，已四年未还乡省亲矣！

新馆绿琉璃瓦，汉白玉栏杆，画栋绘樑，藻井有“天禄石渠”字样，又搬入原圆明园文源阁石碑、华表、石狮，崇楼峻宇，俨若皇宫。馆藏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，因名馆前大街为文津街。钢架书库，软木地板，为当时罕见之新式图书馆。于1931年6月底落成，由蔡元培先生主持开幕式。而余在四五天后（七月初）方到馆，住景山西陟山门大街，大高殿后，御史衙门

图书馆宿舍。

北京图书馆是历史悠久、闻名世界的国家图书馆，它继承了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、清代内阁大库的藏书，其中少数印本还盖有南宋皇宫“缉熙殿”、元代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大朱文印。其它宋、元、明、清佳槧名抄，均希世之珍，成为我国的文化大宝库。不过解放前藏书总量仅有一百四十五万册。1957年底为四百七十九万册。前几年早已超过一千万册，书满为患，故有建新馆之必要。余有机会能在这个环境优美的琅环福地，连续工作四十年，可说是幸运的。

袁馆长由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毕业。他掌管图书馆时，事必躬亲，连厕所日必视察数次，下班后一人仍在室内办公。他不光是发挥一个公共图书馆的职能，同时把图书馆办成一个学术研究机构。他网罗了徐鸿宝（森玉，精于板本金石）叶渭清（左文，专长宋史）向达（觉明，专长中西交通史与敦煌学）王重民（友三，专长目录学与敦煌学）孙楷第（子书，专长小说戏曲）贺昌群（藏云，专长历史）谢国桢（刚主，专长晚明史）刘节（子植，专长金石）王庸（以中，专长地理）梁启雄（述任，梁启超先生幼弟，专长荀子）赵万里（斐云，专长板本）谭其骧（季龙，专长历史沿革地理）李德启（专长满洲文）蒙古喇嘛彭色丹（专长蒙文，藏文）于道泉（专长藏文）顾华（通六七种外文，尤精德文）等先生，都是学有专长，在各个学术领域内先后卓有成就，真是极一时英才之盛。所惜者上述北图老人，今存者不过孙子书、谭季龙、于道泉等数人而已。在这种浓厚的学术空气中，我自然也受到熏陶切磋之益。

余因国学系（中国文学系）毕业，被分配在中文编目组，专编古书。组长嘉兴谭新嘉先生（志贤，编辑嘉兴谭氏遗书，由厂肆木刻）是京师图书馆老人。同事有梁廷灿（梁启超之侄，出版《中国历代名人生卒年表》）、徐崇冈（满族）、杨永修（主要

编日文书)等，他们都比我大十多岁，得到他们的帮助教益。

古书大部分为线装，也有少数包背装、经折装。编目录首先要看懂书的内容性质，才能给分类号码，其次要查明作者时代，才能给著者号码以及板本年代、地点，看起来简单，有时也不容易。如有人将清初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，一部痛恶君主专制的政治哲学书，归入边疆类；把记载尼泊尔的书，分入外蒙古类。《世说新语》或作王义庆著，不知作者乃刘宋皇族刘义庆，封临川王，并非临川人，姓王。乾隆刻本《书隐从说》为清吴江袁栋、漫恬著，自孙氏《中国雕板源流考》引作袁恬，各家引用，遂沿其误。至于刻板有原板、翻板，书贾往往以明翻宋元精雕，撕去序跋，冒充宋元板。又雕板活字，有的不易分。至于木活字、泥活字、铜活字，更难细别。

我进中编时，头两天就发见铅印本《带经堂书目》原卡片目录作孙树杓编，实则编者姓陈，名陈树杓，是福建藏书家陈徵芝之孙。陆心源称“其孙字星村者，亦略知书”。因原书排印时作“孙树杓星村编次”，孙字与其他六字一样大小，所以很容易被认为孙氏所编。后来又发见其他卡片错误不当之处，亦即随时改正。

我编目录深恐出差错，闹笑话，故必细阅本籍内容及序、跋、牌子、附录，弄清楚作者真名实姓，字号籍贯，刻板年代，地点。因著者号码要按年代排，故须详考著者的生卒，或仕履年代，有时在本书找不到，就利用传记或地方志。因此编目速度较慢，每日约五六种或十种。先写草片，审核后，再交人写成正式卡片，然后由排片员分排成书名、著者、分类三大类卡片目录，供众阅览，就是这样搞了六年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袁同礼馆长鉴于馆中只有卡片目录，而无书本目录，万一发生事故，就难以补救。于是发动全馆力量来搞，但编印出来的只有谭其骥的《地方志目录》，萧璋的《目录类书

目》两部。其他古书因数量庞大，难以完成。当时参加人员有谭志贤、梁述任、王育伊、贾芳等七八人，而余则负责“史乘类”，谭新嘉先生故后，又分担其别集部分。当时由抄写人员将卡片目录分类抄录于书本上，因卡片目录杂出众手，又经历多年，抄在一起，就发见很多牴牾，一书或分在数处，著者、板本著录不一，故仍须入大库核对校正。抗战期间大家编成《馆藏普通线装书目》（新出版书未收）共二三十册，其中史部三册及一部分集部目录，多为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注明作者生卒仕履，及书中内容，花去精力不少，然始终未能付印。这一大堆原稿后存参考组。解放后又以一二年之力，主编《中国边疆书目》（内部油印），参加者有刘汝霖同志及人民大学地理系孙某。

初进馆时，读了向达先生翻译的美国卡德教授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》数章，觉得它很有价值；惟出于外人之手，繁征博引，而未能探其根源。且印刷术为我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，对人类社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，而印刷史由外人代庖，心实耻之。乃不自量，蚊力负山，立志要写出一部《中国印刷史》。因此在编古书卡片目录与书本目录的同时，就注意收集有关板本印刷的资料，当时多记在草片上，后写成大小笔记约七十本，其中有《宋版书经眼录》二册，《宋刻工名录》二册。将馆中所藏全部宋板书约三百五十五种一一翻阅，就化了二年多时间。因为这只有利用公余午睡及星期日才能到善本阅览室借阅，只许用铅笔记录，以防污损原本。并翻阅了所有明嘉靖重抄《永乐大典》残本二百余册（有部分照片复制本）。数十年内把大书库数千种地方志、诗文集、笔记、杂说及日文、西文板本目录书，涉猎一番，也不过是大书库中数十排钢架而已。

日本人利用退还庚子赔款，在北平设立东方文化委员会，成立东方图书馆，在市上抢购方志、家谱及各种古书，续修《四库全书》。邀请北平市各大学部分教授、讲师写提要，稿酬从丰。

馆中也有个别参加的。当时余认为可耻，拒绝其邀请。

到馆不久即发生“九一八”事变。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卢沟桥，宋哲元部队被迫自卫。第二天往馆上班，门口已有日军把守，不许馆员出入。那时感到国家危亡，平昔所从事的板本目录，只是书皮之学，对国家兴亡并无实际用处。于是决心抛弃，改弦易辙，开始研究安南史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图书馆在重庆、昆明的人员陆续回北平复职。余由馆员被提升为索引股股长（此职原由王重民先生担任）。余鉴于一般人物不见正史或杂书者，地方志中往往有他的传记，于是草拟一计划，把全国方志中传记（包括附传）人名，一一作出索引，先从一省或一时代着手。后与友人朱士嘉先生谈起此事，我说：“此事太大，可先从现存少数宋元方志做起”。朱氏欣然同意，很快就编成《宋元方志传记索引》一册出版。前些年他受北师大之聘，负责指导《明代方志传记索引》工作，曾来信说“同学们已写好卡片十四万张”。但未见印本。更希望能将清代六千多部方志的传记，也搞出索引，这对学术研究说来，真是功德无量。

解放后，馆名改称为“国立北京图书馆”。初由王重民先生代理馆长。为纪念太平天国起义，馆中举办小型书刊展览，当时向觉明、金毓黻、荣孟源等先生均热心此事。余与王会庵同志编成《太平天国资料目录》出版。先从其中挑出有关重要资料，编成中国近史资料丛刊第二种《太平天国》八册。

1952年10月馆中举办中国印本书籍展览会，其中有很多是现代著名藏书家新捐献的珍本。当时张全新（铁弦）副馆长叫我写篇介绍，我就写了一篇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》，刊载于《光明日报》，后被《文物参考资料》转载。廖承腾冲李根源先生（印泉）之嘉许，认为可以传世。于是把弃置多年的板本目录，又重新捡起来，加以扩充，成为《中国印刷术的发

明及其影响》一书，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1978年再版。日本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神田喜一郎博士见之，以为这是“一部真挚诚恳的好书”，嘱广山秀则先生译成日文，于1960年（昭和三十五年）在日本京都出版。一时日本、苏联、美国刊物上有书评介绍或报导。1977年日本蕨内清教授译注卡德书中，于拙作及拙文本活字、铜活字部分多加引用。李书华先生1962年于香港出版《中国印刷术起源》一书，大部分引用卡德及拙作资料。1981年6月10日王益同志在《印刷战线》上对卡德书有好评，并说拙作“提出了不少独创的见解，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，成为研究中国印刷术发明史的最权威的一部著作”。过蒙夸饰，徒增愧汗。有的大学图书馆学系或以此为课本。不过旧作只是《中国印刷史》的首尾两部分，自五代、两宋至清末印刷史的主体，并未涉及。1963年虽出版了《活字印刷史话》（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之一，与龙顺宜同志合写），1979年二版三次印刷，只一万余字，过于简略。后扩充至五万字，成一专书，虽雇人誊清复写，因文革开始，未能出版。

1953年武进冯仲云同志来任馆长，冯氏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，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，立有大功，解放初期曾任东北松江省主席。曾肄业于清华大学。尊重馆内知识分子，知人善任，无官僚架子，有魄力。新造大书库，成立儿童阅览处，用卡车巡回厂矿，送书上门，开办馆际互借，常请专家学者举行学术报告会，活跃首都学术空气，受到馆内外的好评。

冯馆长特成立参考研究组（后称参考咨询组，简称参考组），任余为组长，戚志芬副之。组内有刘汝霖、李希泌、朱家濂、丁克刚、龙顺宜、汉佛语、张玄浩、关振泽等同志，均为大学毕业，或曾任教大学，或留学苏联。后来又有研究数理逻辑的前清华大学教授张申老（申甫，崧年），任参考部主任。组内大力开展编纂书目及解答读者咨询工作。先后编印文学、历史及机械、

物理、化工、建筑等科技专题馆藏书目五六十种，免费赠送，便利各方使用，作为经济建设参考。及馆藏《中国医药书目》出版后，兄弟馆仿编者六十家，于是有人汇编成联合目录收中医书七千六百余种。

报纸报导我组工作后，本市及外地单位或个人口头谘询，或来信谘询骤增，平均每年答复一千五百件左右。有的名人如郭老也不耻下问，经常命其秘书打电话来谘询有关问题。日本、苏联、欧美各国也来信询问，如法国研究王维、李白的汉学家窦丹成了老主顾。组内同事能和衷共济，本着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原则，尽量利用各种工具书，参考古今中外书刊，找出答案，如遇疑难问题，共同出主意，想办法。组内做出一点成绩，主要由于大家的努力。余个人解答的不过十数国，而越南史学家陈文理、明峰、陈辉僚、邓泰梅，柬埔寨李添丁，及英国李约瑟博士先后来馆找资料，均由余接待解答。因工作比较繁忙，一九五八年后乃辞去组长职务，专任副研究员，以便有较多时间研究印刷史。

冯馆长在任一年余，即离去。继有丁志刚、左恭两位副馆长负责馆务。

从文化大革命起，目不识丁最光荣，有文化的是臭知识分子，都成了牛鬼蛇神，被批斗。我也在所难免，个人多年积累的书刊资料损失很大。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“五七”干校，劳动约一年余。一九七一年申请退休。自1931年进馆，至此凡四十年，离开第二故乡北京，返回嵯县老家。所幸八十五岁之老母康强无恙，而余亦年逾花甲矣，母子团聚，倍加喜悦。

退休后，本打算两三年内完成印刷史一书，故虽有国务院办公厅长途电话嘱速返京工作，及北图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兰州大学、南京大学等再三邀请，均以家居奉母著书辞谢。惟为补充资料及访友，一九七二年乃有八闽之行，至母校。在集美参观陈先生故居，见到陈氏之雄伟墓葬屹立海滨。访泉州古刹开元寺，见

宋福州板藏经残页不少。又访得南安九日山东麓唐安南人姜公辅墓，翁仲虽存，墓已失修，山顶有宋苏才翁书“姜相峰”三大字石刻。至福州与老同学包树棠教授谒闽王祠，抄录碑文，城内开元寺，宋代曾刻《大藏经》，今已改为工厂。本拟往宋元明以来出版中心建阳麻沙书坊，以无游侣而止。

一九七三年四月至宁波天一阁。范氏天一阁为国内现存惟一最古之私人藏书楼，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与阁中邱嗣斌、骆兆平、洪可尧三同志挑选新接收大批图书中之善本，每日翻阅五、六大箱或十箱，凡五十日。内清人著作多为别集、方志、四明文献，明板有经厂本、藩府本、金陵、建阳坊本、活字本，亦有明清抄本，宋元板极少。其中有阁中旧书三千余卷，此次又失而复得，珠还合浦，亦书林佳话。得见景泰元年（1450）书法家朝鲜王族安平大君李瑢亲笔《般若再送岩上座归南序》绢本，东洋装，一册。旧误以为日本人著作。《每怀吟草》二册，为越南人阮述光绪初奉使来华贺万寿，旅途吟咏与华人唱和之作，颜体大字，避越讳“时”，而不避“历”，疑即阮氏手稿。宋《初虞世必用方》早已失传，今阁中竟发见旧钞本。又得见阁主人明范钦、与五代武肃王钱镠、忠懿王钱弘俶画像，及名人字画。又曾至餘姚图书馆看书。

初余在四明读书时，即闻宁波有范氏天一阁者，曾一往游。只见景色荒凉，有一贫苦老嫗在阁前烧饭。楼梯前挂有一白牌，上书范氏家规，禁止登楼。自餘姚黄宗羲于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破例登阁观书，继之者有徐乾学、万斯同、全祖望、钱大昕、阮元、薛福成等。余住阁旁月余，适为黄氏登阁后之三百年。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再登，虽未能继美前修，也可说是平生快事。现在阁中修饰一新，又在附近新建一书库，阁前小池，所谓“天一生水”，金鱼可数，香樟古木，假山修竹，城市山林，成为宁波旅游名胜古迹。

一九七五年重至北京，每日赴北图找资料，凡两月。以明武林观妙斋刻本《商子》、清抄本《光绪丙申王公侯伯文武大臣生日住址考》等八种书赠馆，后者已被收入《全国善本书目》。

一九七七年八月底赴上海图书馆看书，蒙顾起潜馆长予以借阅方便，每晨由旅舍乘车至馆阅览。会见老友谭季龙同志于复旦大学，备极欢慰，惜瑞安李师已于数年前逝于该校矣！上海旅居一月回杭。在西湖浙江省馆阅览二旬。

一九七九年五月被邀赴京审查《全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，得见朱士嘉、冯宝琳、杨殿珣、臧威凤、吴丰培等同志及各省编目负责人。余提出每志须冠年号，以便读者利用。草目中洪武《临汀县志》，实为从《永乐大典》抄出之宋开庆《临汀志》。开会约一月，即至文津街北图及柏林寺分馆看书。九月初回浙。

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，每年至杭州浙江省馆阅览撰述边改边写，又增又删，如明藩府本即先后改写六七次，老牛破车，进展迟缓。乡间冬日室内无火，零下二、三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寒舍，冷气侵人，手生冻疮。夏日酷暑三十七八度，汗水沾背，仍坚持写作，劳神苦思，废寝忘食。老母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一再嘱咐：“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？此书写好，不要再写别的书了。”本拟在她生前出版，以博老人一笑，不料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七日弃养，享年九十七岁，呜呼痛哉！而写作最困难的是乡间无参考书，连人名、地名大辞典，也要到县城去借。有时步行至崇仁中学，借《明史》、《文物》杂志，所以只有就手头所存七十本笔记，加以整理，写出初稿，请全英妹誉清，约四十五万字。

忆及一九五八年左右，我国参加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展览会，左副馆长向文化部推荐由余挑选古代书籍部分，及各种书籍装订，如卷轴装，蝴蝶装、包背装、线装及嵌珠宝的藏文夹板装等样本，写出说明（由顾子刚同志译成英文）。后来听说古籍部分得到金牌奖。

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赴加拿大展出，1981年五月五日寄来正式聘书为印刷术部分专业顾问。余乃就寄来之陈列提纲提了不少意见，回信说“悉已照改”云。

瑞典皇家图书馆研究亚洲印刷史的艾思仁 J、S、Edgren 先生，早在一九七四年即蒙其寄赠大作。去年九、十月自美国来信，欲来华与鄙人会晤，商谈翻译拙稿《中国印刷史》成英文本。今年二月他来杭州，而余已回乡过春节，未能会晤为憾。

解放前，余有感于国人对越南史地多不了解，曾以十余年之力就北图藏书辑录成《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》与《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》两稿，蒙史学界前辈张星烺（亮尘）、王桐龄（峰山）先生赐序。这两部书稿均未付梓。

北图藏书虽富，但关于越南人著作不过二三种。余向左恭副馆长建议，向越方征求名著潘辉注《历朝宪章类志》、医书《懒翁心领》等多种。又向日本东洋文库征求《大南实录》等胶卷，以便利学者研究。

余平生无他嗜，惟研究印刷史与越南史，实在太无出息，年近耄耋始克完成《中国印刷史》，虽化了四五十年心血，但由于水平低、能力差，书海无涯，疏漏舛误，自知难免。近年由于忙印刷史，将越南史又抛弃脑后。久欲就所有数十本旧笔记加以整理，写出一部《中越关系史》，此虽有违慈训，而自认为这是我的责任，有撰写之必要，并望能于数年内完成。

1984年4月28日张秀民写于瞻山老家时年七十七岁

张秀民主要论著目录

印刷史

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人民出版社1958年 1978年再版

- 日文版 日本广山秀则译 神田喜一郎博士序 京都关书院
出版 昭和35年(1960年)
- 活字印刷史话 (中国历史小丛书) 中华书局 1963年初版
1979年二版三次印刷
- 金源监本考 图书季刊 二卷一期 1935年
- 宋孝宗时代刻书述略 图书馆学季刊 十卷三期 1936年
- 宋光宗时代之刻书 天津大公报
-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 光明日报1952年9月
30日 又文物参考资料转载
- 雕板印刷开始于唐初贞观说 社会科学战线 1979年3期
- 再论雕板开始于七世纪唐初贞观说 上海图书馆杂志
- 五代吴越国的印刷 文物 1978年2期
- 南宋刻书地域考 图书馆 1961年3期
- 宋朝的印工和装背工 文献 10辑 1981年12月
- 辽、金、西夏刻书简史 文物 1959年3期
- 明代南京的印书 文物 1980年11期
- 明代北京的刻书 文献 1辑 1979年
- 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 文物 1979年6期
- 明代徽派板画黄姓刻工考略 图书馆 1964年1期
- 太平天国的刻书 文物 1961年1期
- 清代泾县翟氏的泥活字印本 文物 1961年3期
- 明代的活字印刷 史学史资料 1980年1月
- 元明两代的木活字 图书馆 1962年1期
- 清代的木活字 图书馆 1962年2、3期
- 明代的铜活字 图书馆 1961年4期
- 清代的铜活字 文物 1962年1期
- 朝鲜的古印刷 历史研究 1957年3期
- 南朝鲜发见的佛经为唐朝印本说 浙江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

年 4 期

越南史

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（稿本）

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（稿本）

占城人Chams移入中国考 学原 2 卷 7 期 1948年

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 学原 3 卷 1 期 收入明史论丛(台湾版)

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 兰大学报 1979年 1 期

永乐《交趾总志》的发见 兰大学报 1981年 1 期

越南古币述略 学术论坛 1981年 3 期

所谓《永乐大典本交州记》 图书馆 1962年 4 期

越南的医学名著—《懒翁心领》 图书馆 1963年 1 期

其 他

张氏始祖文节公（知白）年谱（稿本）

宋剡川姚氏西溪集辑本 宋姚宽著 张秀民辑佚 稿本

1981年嵊县文管会油印本

北平牡丹记 进德月刊（济南）

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址记 北平图书馆馆刊 10卷 4 号

中国历代农具一览表 图书馆 1963年 3 期

文房四宝 人民中国 1957年 8 号 又日文版俄文版

中国与尼泊尔友谊的回顾 光明日报 1961年 10 月 3 日

太平天国资料目录 与王会庵同编 195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中国古代科学家 内有蔡伦、毕昇、王祯三篇 1959年

北京科学出版社